

■对 话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杨 辉：地域性终究需要汇入总体性的宽阔河流之中

□本报记者 康春华



建构融通古今的“大文学史观”

记 者:杨辉老师,您好!恭喜您的《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能否请您首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部著作的基本架构?

杨 辉:这部书是我近年来关于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成果合集,主要围绕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赓续问题展开。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现实主义传统的深化”,以柳青、路遥等作家的作品为例,讨论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赓续及相关问题。全书从总体性视域、社会主义新人塑造以及“具有质的规定性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传承和发展等方面,梳理了延安文艺以降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核心精神和美学品格。主要试图用“以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为核心、融通中国古典传统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通三统”的文学史观念,重新理解晚近70余年当代文学的流变及其意义。中编“古典传统的接续和转化”,主要讨论当代文学接续和转化中国古典传统的经验、路径、方法及其意义,尝试建构融通古今的“大文学史观”,并以之为基础重解中国文学古今演变问题。下编“古典批评文体的当代转化”,是以“大文学史观”为视域,以当代文本和文学现象为案例,在促进古典文论现代转化的基础上建构文论“中国话语”的探索和尝试。批评文体的现代转化是古典文论现代转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新激活古典文论重要概念、术语、范畴所关涉的文化观念、美学追求和运思方式的可能性路径之一。无论是以当代文学为借径促进中国文论话语的建构,还是古今融通的“大文学史观”建构,最终均将汇入“通三统”的文学史视域之中,成为赓续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基本路径和方法。

记 者:这部理论著作体现了您多年来在“社会主义文学传统”领域的专注深耕。您对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研究,肇始于何时?能否谈谈您与这一主题的渊源与关联?

杨 辉:关注并研究社会主义文学传统,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思考的必然。2010年前后,因动念写作一部《路遥传》,我在做了比较充分的案头准备工作(比如自编《路遥年谱简编》)之后,开始了较为漫长的调研走访。路遥生活和写作过的地方,几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正是在实际调研过程中,我的视野逐渐打开,对路遥的心路历程及其创作的变化性的理解逐渐清晰,此前未加注意的一些生活细节时常会呈现出意想不到的重要意义。走访过程虽然辛苦,但收获可以说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延川县,我搜集到了一些路遥早期佚作。这些至今未被收入《路遥全集》和各种选集的作品启发我重新从整体意义上思考路遥的写作及其与当代文学的关系问题。《路遥文学的“常”与“变”——从〈(山花)时期〉而来》这篇比较长的文章,就

是这一时期思考的集中呈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此浮现,那就是在路遥的写作中,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贯通”远大于“分裂”。被视为当代文学史常识的、发生在1970至1980年代之交的具有“断裂”意义的“新”“旧”之变,在路遥的写作中并未发生。换句话说,既定的文学史观念并不能妥当解释路遥文学的“常”与“变”及其所表征的重要问题。路遥文学“超出”这一时期文学史观念成规的地方,正是延安文艺以降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整体价值所在。沿着这个思路,我还写了《再“历史化”:〈创业史〉的评价问题》《〈讲话〉传统、人民伦理与现实主义——论路遥的文学观》《“未竟”的创造:〈创业史〉与当代文学中的“风景政治”》。《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是这一思考的阶段性总结。也就是在这一篇文章中,我尝试提出“通三统”的文学史观念,希望由此打开更为开阔的文学和理论视野,充分发掘当代文学70余年的内在连续性及其奠基性意义。唯有在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总体性视域中,文学史观念的“裂隙”、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方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记 者:这部著作具有鲜明的理论抱负,您试图超克或悬置“重写文学史”和“再解读”研究理路,在更宽广的思想和文学史视域中历史性地理解当代文学70余年核心观念的流变问题。纵观当代文学研究现场,您认为,这一研究理路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何在?

杨 辉:如前所述,由路遥研究所引发的思考,几乎自然地拓展到对当代文学70余年的整体理解。而以路遥写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的1980年代为原点,上推30余年,可以延伸到对柳青文学遗产尤其是《创业史》价值的持续思考;下延30余年,则可以拓展到对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现实主义创作的研究。这是理解当代文学70余年观念流变及其意义的思路之一。我尝试暂且悬置“重写文学史”及“再解读”的研究理路,从时代精神总体性的视野中,重新理解和阐释当代文学基本传统的价值。这便是“通三统”文学史观念提出的背景,以之为基础,既可以重新理解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流变及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也可以充分阐释当代文学接续和转化古典文脉的经验、路径和方法。同时,亦可超克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的观念窠臼,打开深具时代和现实意义、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文学和理论视域。不仅柳青、路遥的文学遗产可以得到重新理解和阐释,新时代涌现的密切关注新的现实之变、力求以中国智慧和中华美学精神表达时代新变的作品也可得到更为充分的价值定位。

重建自我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及复杂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联

记 者:书中所论述的很多作家,既与陕西这片土地存在着血脉联系,又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紧密关联。您认为地方性(地域性)与社会主义文学所具有的总体性之间有哪些重要的内在关联?

杨 辉:可能受惠于古典思想的影响,近些年来,我愈发

意识到无论研究多么宏大的议题,个人生命的实感经验都是不可或缺的出发点。个人对切己的现实议题的感知、对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感通、对更为开阔的天地消息的感发,均会影响到其所关注的问题论域以及可能的回应方式。因此,我也特别感念陕西这块文化厚土对我个人写作的滋养。延安文艺发端于陕西,中国古典思想、文学和文化,在陕西也有极为深厚的积淀。这些内容,几乎都可以自然地转化进个人的思考和研究,影响甚至形塑个人的文学和文化观念。比如我们学校新校区,距柳青当年扎根的皇甫村不过10余里,距极具历史、地理、文化意义的秦岭不过20余里。山川地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既影响了千百年间古今人物的文学创造,也会影响评论和学术研究的基本面向。陕西地域文化在多重意义上影响甚至成就了陕西数代作家的写作,但他们的作品并未局限于此。如路遥所言,柳青笔下既有对蛤蟆滩各色人物生活和命运变化的精微叙述,更有基于中国甚至世界视野的宏阔表达,是“尽精微”和“致广大”的结合。地方性(地域性)终究需要汇入总体性的



宽阔河流之中,才能彰显其价值和意义;反之,如果缺少甚或没有这样的关联,便可能滑向一个狭隘的视域而不自知。在这一点上,陕西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无疑有着颇为重要的参照意义:一是从时代精神总体性意义上密切关注正在行进中的社会现实;二是充分感通底蕴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打开宏阔的文化精神视野;三是始终坚守具有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因应新的现实语境之变,赓续和发展这一传统。这是陕西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基本面向,也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核心要义。

记 者:您对当代作家的细致解读令人印象深刻。您曾提出,以柳青等为代表的优秀作家,将生活世界中的诸多细流引入宽阔的创作河床上,使看起来平常的生活有一种巨大而澎湃的思想与历史容量。您认为,在今天,创作者应当如何学习柳青这种创作精神?

杨 辉:自我与宏阔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关联,很多时候并不会自然发生,而是需要写作者做长期的、持续的自我拓展的工作。细读柳青的创作谈以及他剖析自身的思想和美学观念的论述文字,可以发现,在柳青的文学观念中,思想修养和文章修养皆在持续展开。《转弯路上》《美学笔记》《柳青随笔录》及《柳青传》收录的柳青晚年谈话,皆是比较典型的文本。而《在旷野里》和《创业史》中关于人物“新”“旧”观念的对照,“新人”在创造新生活过程中的自我创造,已然包含着深入的自我修养工夫。“身”可以修,可以“养”,可以在克服现实种种困难的过程中不断磨砺从而抵达一种理想的境界——其极致处,甚至可以参天地、赞化育。这是古典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柳青说过,“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其中蕴含着的“自我”与“世界”的辩证关系,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是柳青作为作家在党性修养和文章修养上给后辈写作者的重要启示。由自我修养出发,层层展开宏阔的世界关切,即属古典思想由“内圣”而至于“外王”传统的要义所在。或许还可以借用理论评论界近期热议的“大文学观”,来进一步思考

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与传播,需要作者、编辑和评论家共同努力。与会者认为,编辑要以真诚之心对待作家作品,要与作者有真正的交流,只有“诚与真”才是文学永远不可让渡的“椅子”。今天的文学刊物应该主动拓宽视野,建立有效的培育机制,编辑既要守住审美的门槛、确保刊物质量底线,又要积极发掘文学新人,成为扶持新人的梯子。AI时代,作家、编辑和评论家都需要坚守人的主体性,坚持自己的审美标准和对文学的情感,不从众从俗,在实际行动中理解和阐释“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教鹤然)

“甘肃文学八骏”作品集在陇发布

8月20日,由甘肃省文联、读者出版集团主办的第四届“甘肃小说八骏”作品集《群山的回响》与第五届“甘肃诗歌八骏”作品集《星群的叙事》新书发布会在甘肃兰州举行。甘肃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正茂,读者传媒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郎军涛,敦煌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先孟以及入选青年作家等参加活动。“甘肃文学八骏”涵盖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等多个领域,自2005年创设至今,已累计遴选培育百余名本土优秀作家。此次推出的两部新书立体呈现了甘肃当代文学创作的厚度与锐度,《群山的回响》汇集了牛利利、王选等8位作家的代表作,《星群的叙事》集结了阿天、王悦等8位诗人的近300首诗作。这些青年作家生长于陇原,既熟稔乡土文脉,又紧跟时代潮流,始终坚持向下扎根、向深求索、向新而行。(杨茹涵)

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的“西湖讲坛”第五讲中,作家、学者

和说明这一问题。“大文学观”之大,既在文学与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也在对底蕴深厚、维度多端的古典传统的赓续与发展。如此,既可以重申文学的社会关切,也可以重解古典传统的丰富意涵,打开更为开阔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视野。古典思想中有境界论和工夫论。境界论申明人之修养朝向外部的生活世界甚至天人宇宙的无尽可能;工夫论则详述抵达境界的基本修养方法。精神修养亦可衍生出文章修养。如何与柳青一样,充分感应时代精神总体性,在宏阔的视野中理解和处理个人生命实感经验,既涉及精神修养,也关涉文章修养。换言之,需要努力超克将文学视为个人情感的自我表达的狭窄视域,重建自我与时代、自我与他者、自我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及复杂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联,由此抵达前述“尽精微”与“致广大”有机结合的境界。与之相应,中国古典集体皆备的文章观念亦可效法,思与言皆可有更为丰沛的能量和更为开阔的视野。既不拘泥于个人情感的自我表达,目光亦向广阔的外部世界、复杂的精神传统敞开,则所见所思自有不同。这是学习柳青创作精神的重要方式,也是“大文学观”之于当下创作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关注“社会主义新人”的新情感、新经验

记 者:“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话题也是您研究的重点。您认为,在技术与媒介不断变革的当下,作家如何才能更生动地书写“社会主义新人”?随着新大众文艺浪潮的兴起,素人写作者笔下是否已经涌现出“社会主义新人”的诸种特质?

杨 辉:随着时代阶段性主题的自然调适,“新人”的意涵也在不断生成、变化之中。这是“新人”和“新生活”交互创造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新的技术和媒介环境下,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所面对的生活场景也已发生巨变,既有的想象和处理现实生活的方法面临种种挑战。可以近年来的乡村“新人”书写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由于获取信息的方便快捷,身处乡村的人物也可以迅速而全面地获取关于广大的外部世界的种种讯息。这些讯息甚至可以打开他们对于个人生活世界的全新理解。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便是“新人”对其此前习焉不察的乡间自然风景的意义的“发现”,以及对人在天地之间的生命状态的精神感应。这种感应和发现,既是人物重启传统文化的尝试,也是创造新时代新文化的必然结果。这些因素,皆可打开“新人”在创造新生活过程中自我创造的新境界、新情感、新经验。书写这些新经验及其深广的时代意义,是新时代文学“新人”塑造的要义之一。与此同时,在新媒介促进下,新大众文艺蓬勃兴起,很多身处生产生活一线的劳动者拿起笔来书写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经验。这本身便是“人民文艺”进入新时代呈现的新状态,是时代“新人”自我创造和自我表达的重要表征。他们的作品,属“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大多不事雕琢,也不受当代文学传统观念和审美表达方式的“规约”,自有生命自内而外焕发出的勃勃生机,素朴的叙述中自蕴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他们在日常劳动之余的文学创造,可以表征新时代“新人”的基本特征。其现实和文学意义,正在被深入讨论。

记 者:我们每个人都深深感到技术对于文学、人文的影响正在显著发生。我们生活在“未来已来”的世界之中。您认为,如何看待技术浪潮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

杨 辉:历史地看,晚近70余年来,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核心精神一以贯之,但也因应新的现实语境之变的自然调适,存在着“常”与“变”的辩证关系。以虚拟世界的独异创造象征性地回应具体的现实疑难,亦是深具现实实践意涵的社会主义文学要义之一。新技术的发展,的确对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影响巨大,也给出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提出了很多紧迫、难解的新命题,考验着写作者的创新创造活力以及理论工作者回应现实议题的能力。比如,在AI的冲击之下,人的写作的价值和意义究竟应该如何定位?AI究竟会给人文社会科学既有的研究方法带来怎样的挑战和机遇?凡此种种,“危”与“机”并存,相关问题目前仍在持续展开过程中,一时也难有定论。它们构成了我们的时代前所未有的新经验。对这些新经验、新问题的回应必然会打开与时代相应的新观念、新路径和新方法,成为文学和理论研究“新变”与“代雄”的新可能。这些现实的新变最终都会被融入社会主义文学的总体性视域之中,成为社会主义文学进入新时代后新经验、新创造和逐渐开显的新境界的重要表征。

梁鸿以“一米之光:我们的爱,我们的生活”为题展开分享。西湖文学院执行院长王晓东致辞,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主持活动。

梁鸿从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切入谈到,一个人要意识到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并懂得何为真正的爱。热爱是一种能够滋养生命的精神力量,是从对一草一木、对他人命运的真切感知中生长出来的。唯有先珍视自我、感受自我的“存在”,才能真正理解如何爱他人。在黄平看来,我们唯有拓宽生活维度、平衡自己的身心状态,才能获得新的广阔天地。

《牡丹亭》以音乐剧语汇对话经典

由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制作运营的原创音乐剧《牡丹亭》将于9月28日在中戏东城校区实验剧场首演,并将于2027年元旦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与观众见面。该剧力求以音乐剧语汇对话经典,以当代视角重塑人物形象,向世界传递中国哲学精神、文化智慧与美学品格。

汤显祖的《牡丹亭》是彰显东方浪漫精神的经典剧作。此次创排的同名音乐剧对原著进行了适配舞台表达的重构与打磨,旨在通过现代艺术语言和舞台技术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国原创音乐剧发展提供实践范本。全剧以宋代雅韵为美学底色,融入中西音乐元素,同时将传统意象融入整体叙事,以节气时令承载关键情节,以自然物象映衬人物心境,着力突出青春主题和剧目的当代价值。该剧由中戏师生、校友组成主创与演员骨干团队,是“音乐剧高校联盟”产学研协同取得的又一成果。

(王 覓)

本报讯(记者 罗建森) 8月26日,由上海市作协主办的“传承·交流·创新——文学批评的跨代交流”座谈会沪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孙甘露以及20余位作家、评论家与会。此次活动以批评家程德培的著作《要对夜晚充满激情——七〇话七〇》为引,旨在讨论文学批评如何更好面对不同代际的写作者。邱华栋表示,程德培的批评是一种“有根”的批评,他拒绝用理论强行切割文本,坚持让见解从具体的阅读中生长出来,始终以“在场”来拓展批评边界,身体力行与创作现场同频共振。他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文学遗产,即守护批评的“骨”,在流量面前保持独立的审美判断,不写程式化的人情评论,同时时刻关注当下文化生态,在自我更新中不断生长。希望大家秉持这份信念和勇气,与时代同行、以文学立心,这是对程德培最好的告慰。与会者认为,程德培以“笨功夫”守护了文学批评的根脉,他将批评视作一种不被外界因素裹挟和影响的写作姿态,以近乎苛刻的自我要求不断孕育批评新声。程德培虽非学院派出身,却能够引经据典、视野开阔;虽是“老派人”,却始终关注年轻一代的创作。当下文学批评存在扁平化、同质化的问题,程德培留下的批评精神——将批评家自身的阅读经验与生命体悟和盘托出,对人怀有体恤、对作品保有锐气,恰是一剂对症的良药。

八方文讯

“鲁迅与中国文化的传承、创新”研讨会举行

今年是鲁迅执教厦门大学100周年。8月21日至24日,由厦门大学主办的“鲁迅与中国文化的传承、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建厦门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焜明,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刘献祥,厦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国旺,福建省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林秀美,福建省作协副主席钟红英及15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交流。阎焜明表示,鲁迅将深厚的传统学术底蕴与宽阔的现代视野相结合,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作品,这是鲁迅研究的重要课题。研讨会上,学者们紧扣时代主题,深入发掘鲁迅文学精神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思考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传承创新。大家认为,鲁迅是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一面光辉的旗帜,其文学精神指引我们深耕经典、守正创新,在秉持开放包容的同时厚植精神底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大生命力。(教鹤然)

青年编辑评论家探讨文学的“诚与真”

8月27日,由上海文学杂志社主办的“‘从鲁迅的椅子到青年的圆桌’——青年编辑、评论家座谈”活动在上海举行。上海市作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高渊及30余位青年编辑、评论家参加活动。